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与山东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928—1937 年)

董楷文

聊城大学, 中国·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民国时期,以“通俗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主体的社会教育得到初步发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经济发展濒临崩溃,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为复兴乡村社会、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乡村社会教育被视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并由此掀起了乡村教育运动。以山东地区为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以建立村学、乡学组织为核心,向当地民众普及教育,引导村民参与乡村自治。这些教育活动客观上使当地的社会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和进步,也为当今的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社会教育;社会变迁;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危机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the Changes in Rural Social Struc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1928-1937)

Kaiwen Dong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al education with “popular education” and “civilian education” as the main body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and entered a stag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owever, due to the long-term infighting among warlord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of China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and is facing a serious social crisis. In order to revive the rural society and cultivate construction talen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way, and thus set off the rural education movement. Taking Shandong as an example, Liang Shuming carried out an experiment on rural construction in Zouping, Shand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s the core, popularizing education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guiding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autonomy. The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bjectively improve and improve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and als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oday’s r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social education; social change; rural education movement; rural crisis

0 前言

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内部发生的一切变化的总称,以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方面的变化最为重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乡村社会的近代化程度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近代以降,以“平民教育”和“通俗教育”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也有了初步发展,其中一部分则涌向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引起了乡村社会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乡村社会也由封闭走向开放,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开启了近代化发展历程。因此,研究社会教育的发展特点以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开展情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

1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开展与乡村危机的出现

1.1 社会教育的发展特点

社会教育是指在学制系统以外,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私人 and 民间团体推动为辅助,为了提高失学民众以及全体国

民的素质,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1]。20 世纪初,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仅靠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难以实现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目标。因此,以“通俗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经过萌芽和发展阶段,逐渐在清末民初发展成一股教育思潮。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为推动社会教育的有序发展,政府制定了有关社会教育行政、经费、法规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使得社会教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即各省市教育厅掌管社会教育专项事务,以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实施综合的教育事业;设立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并制定多项教育法律法规,直接保证社会教育的稳步发展。至此,社会教育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并呈现区域性发展的特点。

1.2 乡村危机的出现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来,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国内买办阶级、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互相实行高度的榨取政策,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的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日

益走向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乡村社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当地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开始解体,国家政权的扩张也导致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士绅体系趋于瓦解。科举制被废除后,新式教育的推行又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这些学校不仅没有实现“救国”,反而成为当地精英争权夺利的战场,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从而出现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涌进城市的现状。对此,日本学者田中忠夫通过调查曾对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等省的农民离村情况做过估计,他认为在上述省份中,大约有 4.6% 的农民离村^[2],其中不乏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希望到城市中寻求新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中国近代化的整体进程。

随着农村问题的日益凸显,国民政府和社会精英逐渐认识到民众社会教育对社会改良与进步的重要意义,从而将教育活动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复兴乡村社会、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宗旨,在学校教育制度之外面向农民开展一系列的乡村教育试验来改造农村,这一思潮进一步发展为乡村教育运动。而山东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相对稳定,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客观上有助于乡村教育试验的开展。这一时期,在政府的支持下,梁漱溟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市开展乡村建设试验,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乡村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重建。论文将以该地区开展的教育试验为例,探讨山东地区社会教育的实施成效,以及对山东地区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产生的影响,进而为新时代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借鉴。

2 社会教育与山东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928—1937 年,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措施以扩大统治基础,革新政治文化。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离不开新型意识形态的推广,而教育的实施则是推行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教育设置“最普遍的功能就是社会化,即传递技术技能、知识、价值观和规范。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控制,即学校帮助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3]。同时,基于乡村地区人口基数大、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政治意识薄弱的现实情况,在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开展面向全体人民的乡村社会教育以提高村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参与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任务。对此,梁漱溟采取创建新的农村自治组织,通过教育的手段引导农民参与乡村自治,培养农民新的政治习惯,从而引起山东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

2.1 领导阶层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乡村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确立了自己在乡村社会的权威与地位,承担着连接国家与地方乡村的中介作用。这些士绅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同时又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地位,对官府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从而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4]。到了民国时期,各地的乡绅阶层仍是县、乡政府统治地方的“代理人”,在兴办学校、协调纠纷、组织修路筑桥等公共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方面,山东的邹平市、祁东县的长白公学、辉里小学等新式学校,均由当地士绅所自发创办。这些地方精英凭借自己同县政府官员的良好

关系以及自己的名望与人脉获得办学的资金支持,但也因此容易受到当地经济波动以及士绅个人素质的影响,从而出现部分士绅以教育为目的大量征税以便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同时,县政府对乡村基层学校的支持力度也不够,这些都影响当地教育的发展质量。

基于此,培养更多新型知识分子进入乡村领导层,从而拉近当地领导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首要任务。针对农村的现实情况,梁漱溟提出建立乡与村一级的学校作为教育活动与公共生活中心。1931 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正式成立,主要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及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三部分,其目的是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并指导乡村建设。山东乡建院既是该实验辖区内推行乡村教育的一所高等学校,同时也是乡村建设的最高指导机关,是一个兼具政府职能的自治机构。这里培养的青年骨干人才则会被派往邹平以及山东的其他县去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进而让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与治理当中,以期打破原有的以乡绅为主导的单一治理体系。

1932 年 1 月,训练部派师生 300 余人兴办乡农学校。即在各区设立乡农学校,由研究院下乡同学担任教学,入学学生年龄不加限制,按程度大致分为两部:不识字乡民入普通部,较有程度者入高级部。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则通过当地士绅出面做解释,并利用这些士绅贤达的声望动员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这年冬天,全县共兴办乡农学校 91 处,参加学习的村民达 3996 人。乡农学校接受研究院指导,学校辅导员全部由训练部学生担任。到了第二阶段,在省教育厅的介入下,乡农学校更名为民众学校。随后,乡建院传达县政府关于山东各地毕业生要结合村庄实际组织开展民众学校的指示,并训令各地政府应给予乡建院毕业生先行委任之优待^[5]。“凡经有民众学校筹备成立之一区即作指定之区,以后不拘任何一区,区长出缺除应招章以本院结业生优先任用外,并调任该指定区域以图双方互为照顾^[6]。”尽管在实践中未能严格执行此规定,但也使毕业的乡建院学生得以顺势加入乡村治理领导层,开始浸润于乡村治理的领导阶层。

2.2 组织结构的调整

村学和乡学的建设是梁漱溟对乡村建设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也是开展乡村建设的核心。1933 年,邹平市正式被确立为县政建设试验区,乡村建设实验得以稳步推进,邹平的行政区划也随之进行了调整。整个县被划分为十四个乡,其中一个乡为县城所在地。乡又被划分为若干个村。每个乡和每个村都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学校,即乡学与村学。这些学校不仅是自治组织,也是连接民众与县政府的重要纽带。

村学、乡学组织的具体情况如下:学众包括村中或乡中的所有。一村之众为村学学生,一乡之众则为乡学学生,所以称学众。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闾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领着众人一齐讲求;还恐自家人知识不足,更请位教员先生来指教我们一切。这便是村学的组织^[7]。面对部分仅凭一村的力量难以解决的事情,便需要同临近的村庄联合起来。这个时

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高的人来领导,而这正是乡学的组织。由此,整个的乡村的社会关系就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生关系,村民们听从于知识水平和思想品德更为高尚的理事(由县委委派的常务学董)、学长等人。同时,乡建院的毕业生往往作为教员领导村学、乡学的各项工作。在乡村的领导体系中,既有传统的“有品有学”的士绅,又有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们,新式知识分子逐渐跻身乡村的领导阶层,引发乡村新式领导群体的重建,这无疑是对乡村传统组织结构进行改造的一次有益尝试。

村学、乡学的兴办进一步扩大了村民受教育的机会,在提升入学率方面效果显著。截至 1935 年,村学的成人部共有 116 个班,学生 3455 人;妇女部 29 个班,学生 558 人;儿童部 93 个班,学生 2069 人^[8]。为解决贫困儿童失学的问题,乡学村学还开展了“共学处”的办学方式,采取在校学生教授失学儿童的方式,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习知识和相关技能。由于这一教学方式时间灵活,且多在饭后的闲暇时间开展,既不耽误日常的耕种工作,还能学到有用的知识与技能,因此得到了人们的积极响应。到了第二年就有 262 个共学处建立,共拥有学生 2227 名,到 1937 年时,共学处已达 446 个,学生也上升至 5468 名^[9]。这样一来,共学处仅在两年的时间里就将失学儿童的数量变为原来的一半。通过参与集体学习,村民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他们也逐渐树立了团体意识,开始主动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努力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社会教育对解决乡村危机的影响评估

3.1 民国时期山东乡村的建设情况

在社会结构方面,社会教育的推广有助于打破固有的社会阶层,促进社会流动。社会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农民有机会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共学处、夜校、妇女班等组织的建立也让许多失学的儿童、青年得以通过短期教育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与各项生活技能,从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乡村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政治结构方面,社会教育推动了乡村政治的民主化。教育的普及使农民开始意识到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责任。以村学、乡学为代表的村民组织切实起到了连接广大民众与县政府的重要纽带。董事会制度改善了乡村领导阶层的构成情况,除了当地士绅外,还吸收了学校教师、老人、接受研究院培养的青年农民和师生,能较为广泛的反映民意,有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从而缓和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通过对村民的指导与管理,乡村自治的范围扩展到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能够主动参与到乡村的公共事务当中,从而扩大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率。同时,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乡村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知识分子持续外流的趋势。

3.2 对当今乡村建设的启示

民国时期山东乡村的建设情况,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对后来的乡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

过社会教育的推广,乡村地区的文盲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农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升,人们对新式教育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这为乡村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教育的普及也促进了乡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民开始尝试新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

民国时期山东乡村社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从教育资源来看,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仍然相对匮乏,学校数量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简陋等问题较为突出,限制了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此外,社会教育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有待提高。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教育模式的开展并未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乡村教育与乡村治理的推行始终没有涉及农民最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观点抹杀了当时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也是其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最后,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破坏,一些教育实验和改革难以持续深入开展下去,并最终走向失败。

4 结语

综上所述,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梁漱溟的精心设计下,以教育为手段,以乡村建设为核心开展的一次社会实验。尽管在当时对缓解乡村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因其时代局限性而走向失败。以史为鉴,在当今的乡村建设中,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需要的人才,以教育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从而使广大农村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2]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 [3]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4] 邢瑞苗.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变迁[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6):140-141.
- [5] 王先明,王雪.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探索——以民国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8(11):91-98.
- [6]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令[Z].1933.
- [7] 梁漱溟.村学乡学须知[M].泰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社,1933.
- [8] 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9] 邹平市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邹平市教育志[M].济南:山东省出版总社惠民分社内部出版,1990.

课题项目: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与山东乡村社会变迁(1928-1937)(项目编号:CXCXY2024238),聊城大学 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